

孫中山教育思想初探

韦杰廷

邓新华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韦杰廷 邓新华 著

孙中山教育思想初探

湖南教育

孙中山教育思想初探

韦杰廷 邓新华 著

责任编辑：王思中 张 哲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东风路附1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印张：10 字数：250,000

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55—1569—X/G·1564

定价：6.90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孙中山教育思想的认识论基础	(1)
一、“知难论”.....	(1)
二、行是知的源泉和基础.....	(7)
三、“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	(22)
四、行是判定知正确与否的标准.....	(32)
第二章 孙中山关于教育的作用和目的的论述	(37)
一、人“必待教而后学”、“学而后知”.....	(37)
二、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和提高“国民”素质	(51)
三、“人尽其才”是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	(61)
四、要振兴中华，必须振兴教育.....	(68)
第三章 孙中山论思想品德教育(上)	(79)
一、要有理想，要立志做大事.....	(80)
二、培养新的道德情操.....	(102)
三、论自由和纪律.....	(135)
第四章 孙中山论思想品德教育(下)	(147)
一、“国民须人人有爱国心”.....	(148)
二、“要谋中国的自由平等”.....	(154)
三、要维护祖国的统一.....	(164)
四、要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富强之国”.....	(170)
五、要树立爱人民的思想.....	(184)
六、不能抹杀中国文明.....	(194)

第五章 孙中山论智育	(202)
一、教育要教人“知”.....	(202)
二、学问为立国根本.....	(204)
三、要传授“真知特识”.....	(206)
四、要注重科学.....	(208)
五、要传授最新的科学文化知识.....	(212)
六、要培养智力和技能.....	(214)
第六章 孙中山论教师和教与学	(218)
一、关于教师的作用与素养.....	(218)
二、关于教与学.....	(233)
第七章 孙中山关于国民教育新体系的构想	(258)
一、孙中山对封建教育的批判.....	(258)
二、孙中山对国民教育新体系的构想.....	(277)
结束语	(315)
后记	(318)

第一章 孙中山教育思想 的认识论基础

孙中山的哲学思想是孙中山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和军事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孙中山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孙中山继承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传统，依据近代自然科学理论，特别是进化论、星云说以及细胞学说等理论，来说明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肯定精神是物质进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物质在先，精神在后，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力图按自然界的本来面貌来解释自然界。同时，他继承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的知行学说，肯定行是知的源泉和基础，行是判定知正确与否的标准，形成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最精彩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思想。孙中山的教育思想是建筑在他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基础之上的。

孙中山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是他的哲学思想中最光辉最有价值的组成部分。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传到中国以前，它是中国哲学史上最先进的认识论思想。

孙中山的认识论思想，可分四个方面来论述：一、“知难”论；二、行是知的源泉和基础；三、“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四、行是判定知正确与否的标准。

一 “知难”论

1918年，孙中山在《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中，力辟传统的“知易”论，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知难”论。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是针对传统的“知易行难”说而提出来的。

“知易行难”是古代中国认识论中的一个命题。这个命题最初

出自《左传·昭公十年》的“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伪作的《尚书·说命》中篇明确提出了“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这样的命题。它的意思是说：知是容易的，行是艰难的。这种思想，后来的一些哲学家将其概括为“知易行难”四个字。

孙中山认为，“知易行难”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他长期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他曾经指出，当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政府之际，“建设发端之始，予乃不禁兴高采烈，欲以予生平之抱负与积年研究之所得，定为建国计划，举而行之，以冀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隆盛之地焉。乃有难予者曰：‘先生之志高矣、远矣，先生之策宏矣、深矣，其奈‘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何’？予初闻是言也，为之惶然若失。盖‘行之惟艰’一说，吾心亦信而无疑，以为古人不我欺也。继思有以打破此难关，以达吾建设之目的，于是以阳明‘知行合一’之说，以励同人。”^①但是，经过深入研究之后，终于发觉“知行合一”学说也是错误的。“乃废然而返，专从事于‘知易行难’一问题，以研究其究竟。几费年月，始恍然悟于古人之所传、今人之所信者，实似是而非也。……中国事向来之不振者，非坐于不能行也，实坐于不能知也；及其既知之而又不行者，则误于以知为易、以行为难也。”^②为了使“中国人无所畏而乐于行”，使“中国之事大有可为”，孙中山以大量事实论证“行之非艰，而知之惟艰”，倡导“知难”学说，以“破世人之迷惑”。

孙中山强调指出，“知难行易”学说的创立，是学术理论上的第一次革命。他说：“古人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本大总统便要说：‘行之非艰，知之惟艰’。”这是“本大总统学理上的革命。”^③又说：“阳明言知行合一，中国古书又言，知之非艰，行之为难。兄弟思之，此似是而非者也。兄弟谓之：行之非艰，知之为艰。”^④

①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8页。

② 同上。

③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72—73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23页。

这一“学说”的产生，便“打破古人之旧学说”。

孙中山认为，要获得真正的科学知识，是十分艰难的。围绕着“知难行易”这一中心课题，他曾以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十事为例，反复论证知之艰难，论证“行之非艰，知之惟艰”。他指出，饮食这件事，“凡一切人类、物类皆能行之”，可是，大多数人却不懂得饮食的生理过程，可谓“终身不知其道”。不但普通一般人不能知之，而且有些科学家“专心致志以研究于饮食一道者，至今已数百年来，亦尚未能穷其究竟者也。”^①文明之人，终身用钱，但却不知钱的本质。盖“非综览人文之进化，详考财货之源流，不能知金钱之为用也。又非研究经济之学，详考工商历史、银行制度、币制沿革，不能知金钱之现状也。……故曰：世人只能用钱，而不能知钱者也。”^②中国历代能文之士，却不知道“文法”和“文理”（即逻辑——引者）。中国“以文为尚”，“惟文是务”，“然而数千年以来，中国文人只能作文，而不能知文章，所以无人发明文法之学与理则之学（即逻辑学——引者），必待外人输来，而乃始知吾文学向来之缺憾”。^③“人类能造屋宇以安居，不知几何年代，而后始有建筑之学。”“中国之屋宇多不本于建筑学以造成，是行而不知者也。”“由此观之，知之易乎？行之易乎？”^④郑和能于十四个月之中，造成六十四艘之大船，载运二万八千人巡游南洋，示威海外，可是当时并“无科学知识以助计划也”。^⑤中国古代修筑万里长城，开凿运河，也都是行之而不知其道的。“人类之用电气者，以指南针为始也。”中国很早就发明了指南针，但那时“毫无电学知识”。“以今日而论，世界用电之人已不为少，然能知电者，有几人乎？”“最近之大发明为无线电报，不数年则已风行全世。然当研究之时代，

①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60、169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79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79、185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86页。

⑤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87—188页。

费百十年之工夫，竭无数学者之才智，各贡一知，而后得成全此无线电之知识。及其知识真确，学理充满，而乃本之以制器，则无所难矣。器成而以之施用，则更无难矣。”^① 中国制造朱砂、火药、瓷器、豆腐等又有数千年，这些都与物理化学有关，“然当时吾国工匠之制是物者，并不知物理、化学为何物者也。”^② 人类自石器时代以来，已能用“进化之原则”“改良物种”，化野草为五谷，化野兽为家畜，可是，直到十九世纪，达尔文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之基础上，用“二十年苦心孤诣之功”，才创立了进化论。^③ 孙中山认为，从这十件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知确实是十分艰难的。有些事，“则只能行之，而不能知之。而向有好学深思之士，专从事于研求其理者，每毕生穷年累月，亦有所不能知。”可见，“行之非艰，而知之实艰”，“已成为铁案不移矣。”^④

为了通俗地讲解“知难”论，孙中山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说：“我从前知道有一个人家的自来水管坏了，那个人家的主人，请一个工人去修理，那工人稍为动一动手，就修好了。主人便问工人：‘你要多少钱呢？’工人说，‘五十另〔零〕几毫’。主人说：‘你稍为动一动手，固〔便〕修好了，像这样容易的工，何以要许多钱呢？且你不要五十元或者五十一元，何以单要五十元另〔零〕几毫呢？这个工价数目，真是奇怪的很！’工人对主人说：‘你看到我修好了之后，这个工作是很容易的。但是从前何以不自己去修理呢？你从前自己不去修理，要请我来修理，自然是由于你不晓得怎样修理的缘故。我晓得怎么样修理，所以一动手便修好了。晓得怎么样修理的知识，是很难的，所以我多要一点价值，那五十元便是知识的价值；至于动手去实行修理是很容易的，所以少要一点工钱，那几毫便是我动手的工钱。’主人听了这番话之后，便一面点头，一面对工人说：‘你所讲的话很有道理呀！我给你五十元零几毫

①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91、192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93、194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95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85页。

罢’。”①孙中山认为，从这个故事看来，也可以证明不是行是艰难的，而是知是艰难的。

但是，孙中山的“知难”论并不认为知是绝对的难，行是绝对的易。知和行的难易是相对而言的。在他看来，知而后行，这时行就比较容易，不知而去行，这时行就很艰难了。他说：“就知和行的难易之先后说，凡百事情，知了之后才去行，是很容易的。如果不知也要去行，当中必走许多‘之’字路，经过很多的错误，是很艰难的。”②这就是说，相对于知说来，行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行也有艰难的一面，在一定条件之下，行是较为容易的，而在另外一种条件之下，行同样是“很艰难的”。

孙中山虽然看到了在知行过程中难与易具有相对性，但他并未能对知行过程中的难与易进行科学的分析。应当说，“知难”论和“知易”论都具有片面性。因为人们在认识过程中，“知”与“行”都有“难”“易”问题，不能一概而论。

中国古代“知易行难”这一命题，可以作唯心主义的解释，也可以作唯物主义的解释。比如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者王夫之就说：“艰者必先也，先其难而易者从之易矣”。③意思是说，正因为“行难”，所以“行”必须在先，“知”在“行”之后就显得较为容易了。从而提出了“行先知后”的唯物主义知行学说。这对于程朱的“知先行后”说，以及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等唯心主义知行观，都是有利的批判。孙中山反对“知易行难”说，但他认为，人类对于许多事情很早以前就开始“行”，但一直都不知道其中的道理，只有通过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不断的“行”、不断的总结和探求，才能获得“真知”——真正的科学知识。这充分说明，“知”与“行”相比，“知”是艰难的，“行”是容易的，人类是先行然后才获得知的。就这样，孙中山的“知难”论和王夫之的“知易”论都一致主张“行先知

①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71—72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73页。

③ 《尚书引义》卷三。

后”，都属于唯物主义的知行学说。

在孙中山看来，“行难”论的危害性是极其巨大的。因为这种思想使人们“不去实行”或“不敢去行”。他指出，“‘知是容易的，行是艰难的’这两句话，真是误了学者不浅！何以误了学者不浅呢？因为求学的时候，十年窗下，费尽脑力，耗尽心血，所求的学问是很不容易成功的。若是有一点儿成功，出去实行，便有人说：‘哼！你求学的时候难，实行的时候更难呢！’大家听到这句话便吓怕了，便不敢去行。不去行，……于是所求的学问没有用处。到了以为学问没有用处，试问那一个还再情愿去求学呢？”^①又指出，我们中国人“以为行是难的”，“把极容易做的事，视为畏途，不去实行，求一点实际的结果”。^②还指出，人们“怕事”，“遇事畏难，不去做艰难的事，只找容易的事去做；好像倒一盆水到地下，总是向没有抵抗力的低下部分去流，是一样的道理。人到了畏难，就不敢轻于尝试，试问文化上怎么能够有进步呢？推究这个原因，根本上的错处，便是在‘知之非艰，行之维艰’。”^③总之，孙中山认为，“行难”思想会带来严重的社会恶果。它“吓怕”了人们，使人们产生“畏难”情绪，因而不敢去“尝试”，不敢去“实行”，甚至不愿去“求学”，从而使中国的文化不能获得长足的“进步”。

在孙中山的眼里，“知易”论的危害性同样是极其巨大的。因为这种思想使人们“不去探求”“科学知识”和革命理论。他说，我们中国人“把极难知的事，看到〔得〕太容易，不去探求。所以二千多年来，对于一切人情物理，都不能登峰造极。至于科学知识极普遍的欧美人，便没有这个心理。”^④

从认识过程的角度看，孙中山“知难”论的根本缺陷在于没有说清“知”这一概念的确切含义。他虽然没有给“知”这个概念下过

①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71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71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71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71页。

明确的定义，但他在自己的论述过程中实际上把知等同于对系统的近代科学知识的认识。他所举的十件事，每件都是说明人们在获得系统的近代科学知识以前，就已经在改造自然界和改造人类社会的实践中获得了大量的成就。

但是，孙中山的“知难”论却包括激发鼓励人们努力学习，勇于实践，变革社会的积极意义。孙中山认为，“夫人不能生而知之，必待学而后知，人不能皆好学，必待教而后学，故作之君，作之师，所以教养之也。”^①因此，他主张“力学”，主张“求知”。认为“当今科学昌明之世，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后乃敢从事于行，所以然者，盖欲免错误而防费时失事，以冀收事半功倍之效也。是故凡能从知识而构成意象，从意象而生出条理，本条理而筹备计划，按计划而用工夫，则无论其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无不指日可以乐成者也。”^②“予之于革命建设也，本世界进化之潮流，循各国已行之先例，鉴其利弊得失，思之稔熟，筹之有素，而后订为革命方略”。可是，“民国建元之初”，“吾党之士，多期期以为不可。”但是，当时革命方略之所以不能实行，“非不能也，坐于不知其为必要也。”“故今后建设之责，不得独委之于革命党，而先知先觉之国民，当仁不让而自负之也。夫革命先烈既舍身流血，而为其极艰极险之破坏事业于前矣，我国民宜奋勇继进，以完成此容易安全之建设事业于后也。”^③从孙中山的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他强调“知难行易”，是为了激励人们力学求知，为实现他的“革命方略”，建设新中国而奋勇前进的。

二 行是知的源泉和基础

从认识论的视角看，“知”和“行”，认识和实践究竟谁决定谁、谁先谁后，这是知和行的基本关系或根本关系。知与行，谁在先，

①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8页。

②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50页。

③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50、151、161页。

谁在后？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知在先、行在后的，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断定行在先、知在后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

中国古代唯心主义者明确地断定知在先，行在后。比如，孔子就宣扬“生而知之”。^①老子也宣扬“不行而知”。^②朱熹则宣称：“论先后，知为先。”^③陆九渊也说：“知之在先，……行之在后”。^④这些哲学观点，显然都属于唯心主义的认识论观点，都属于唯心主义的知行观。有些哲学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知与行谁在先、谁在后这个问题，但实际上他们仍然回答了这个问题。例如，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似乎没有先后问题了。可是，他说：“心是知之本，心自然会知”。^⑤没有行作为基础，不必先去行，不必首先去实践，“心”就可以自然而然地会“知”，“心”可以成为“知之本”。这显然是宣扬知在先、行在后的唯心主义知行观。

与此相反，古代中国的唯物主义者则反对知先行后，不行而知，主张行先知后，知源于行。比如，王充认为，“圣贤”也“不能神而先知”。“如无闻见，则无所状”，“不目见口问，不能尽知也”。“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⑥王廷相说，“讲得一事，即行一事，行得一事，即知一事，所谓真知矣。”^⑦王夫之说，“且夫知也者，固以行为功者也。行者也，不以知为功者也。”“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⑧颜习齐认为，“读乐谱几百遍，讲问思辨几十层，总不能知，直须搏拊击吹，口歌身舞，亲下手一番，方知乐是如此”。^⑨魏源也认为，“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披五岳之山，以为知

① 孔子：《论语》。

② 老子：《道德经》。

③ 朱熹：《朱子语类》。

④ 陆九渊：《象山先生全集》。

⑤ 王阳明：《传习录》。

⑥ 王充：《论衡·实知篇》。

⑦ 王廷相：《王氏家藏集》卷二七《与薛君采二首之二》。

⑧ 王夫之：《尚书引义·说命中二》。

⑨ 颜习斋：《四书正误》卷二。

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①这些言论，都是否定“知先行后”的唯心主义认识论观点的，都是肯定“行先知后”、知源于行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观点的。

孙中山继承了、吸取了古代中国“行先知后”、知源于行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思想，并加以延伸和发挥，既反对了“知先行后”的观点，又批判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认为“其说与真理背驰”，“不合于实践之科学”。^②他运用近代自然科学知识、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史的材料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经验，来解释“知”与“行”这两个范畴，反复论证行先知后，知源于行和行易知难，从而把中国哲学唯物主义认识论思想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

从认识论上看，所谓“知”，实际上就是认识；所谓“行”，实际上就是实践。知与行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诚然，无论在古代、近代，还是在当代，不同的哲学家对知行这两个范畴的理解和解释，是各不相同的。他们都从自己的哲学阵营的视角，给予知与行这两个概念以不同的内容和涵义。古代中国哲学家所说的“行”，指的是单个人的行为、个人的日常生活和道德修养活动，主要是脱离社会实践的封建伦理道德的“躬亲践履”。当时他们没有也不可能理解什么叫科学实验，也不涉及社会生产，更不谈社会政治和社会革命。他们所说的“行”，实际上是极其狭隘的。

在欧洲哲学史上，在马克思以前，没有一个哲学家真正懂得实践的重要性，真正懂得实践是社会的实践，甚至把实践看作是卑下的活动。他们不了解认识是在实践基础上对物质世界的能动反映，而把认识看作是消极的直观，犹如照相那样一次完成的机械反映，他们看到的仅仅是现象，而没有看到本质。即使最杰出的欧洲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也没有真正懂得实践是社会的

① 魏源《古微堂集》。

②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43、144页。

实践。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费尔巴哈“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①

与上述哲学家相比，孙中山所讲的“行”，其实际内容就丰富得多了。他所说的“行”，其内容不仅远远超出了古代中国哲学，而且超出了西欧机械唯物主义者所说的“行”的范围。

孙中山所说的“行”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呢？

第一，在孙中山看来，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活动是“行”。他说：“夫饮食者，至寻常、至易行之事也，亦人生至重要之事而不可一日或缺者也。”“凡一切人类”“皆能行之”。而这种“饮食之事”，“人人行之”，“终身行之”。②可见，孙中山是把“饮食”当作“行”的一种形式看待的。孙中山认为，“用钱”同样是一种“行”。“用钱一事”，“凡文明之人，自少行之以至终身，而无日或间者也。”文明时代，“饮食也，非用钱不可。”衣服也，非用钱不可；居家也，非用钱不可；行路也，非用钱不可”。所以文明时代之人，“用钱一事”，可说是“日日行之”。③在孙中山的眼里，“作文”也是一种“行”。可见，孙中山所说的“行”，包括了人们日常生活的种种活动。

第二，在孙中山看来，人类的生产活动也是“行”。在他的心目中，人类“造屋宇以安居”、建造“洋房家宅”、乃至建筑宏大的“崇楼高阁”等等“建筑事业”是“行”；“施工建造”“船舶”之“造船事业”是“行”；“秦始皇令蒙恬北筑长城”，欧洲所构筑的“约有四万里之战壕”是“行”；“中国运河之开凿”，以及“苏伊士与巴拿马”运河之开凿是“行”；人们制作“印版”、“火药”、“瓷器”、“丝茶”乃至制造“奇奇怪怪层出不穷之电机”是“行”；“吾国工匠之制”“瓷器”，以及“泰西学士”“以化合之法制有机之质”等“种种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60、169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69、170页。

化学工业”是“行”；古人“去尝百草”、“钻木取火”、古代千百万人去“疏通九河”、“改良物种”、“化野草为五谷、化野兽为家畜”，“创作”罗经(指南针)、陶器、朱砂、豆腐等等是“行”；用“农业方法，产生五谷”，以及用“其他工业”方法，以“发展我之生产事业”等更是“行”。^①由此可见，孙中山虽然没有明确概括出生产实践这样的概念，但在他的有关论述中，实际上已把生产斗争当作“行”的一项主要内容。

第三，在孙中山看来，“科学实验”也是“行”的一种形式。孙中山认为，“人类进化，以不知而行为必要之门径。”“夫习练也，试验也，探索也，……乃文明之动机也”。而“科学家之试验也，即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也”。“由是观之”，“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亦即进行“科学试验”，“于人类则促进文明，于国家则图致富强也”。故“为人类之欲生存发达者之所必要也。有志国家富强者，宜勉力行也。”^②孙中山不仅强调“科学实验”乃是“文明之动机”、“人类进化之必要门径”，而且强调从事建设，必须经过调查研究，经过科学之实验。他强调指出，其所制定的《实业计划》，“必当再经一度专门名家之调查，科学实验之审定，乃可从事。”^③他还指出，“古人之得其知也，初或费千百年之时间以行之，而后乃能知之；或费千万人之苦心孤诣，经历试验而后知之。”^④因此，面对各种各样新的观点和新的学说，人们应当通过“试验”这种“行”的形式，来确定这些观点和学说的正确或错误，因为只有“经过试验才晓得对与不对。”^⑤可见，孙中山不仅把“科学实验”当作“行”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且十分重视“科学实验”这种“行”，充分肯定“科学实验”这种“行”对于人们获得“真知”或正确认识的巨大作用。

①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70—195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22—223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49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99页。

⑤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30页。

第四，在孙中山看来，人民、革命党和“伟人”进行革命斗争，探索革命方式和政治改革方案等政治活动，也是“行”的一项重要内容。他认为，实行“革命之破坏”，推翻清政府是“行”，实行革命方略，进行“革命之建设”同样是“行”。他说：“予之于革命建设也，本世界进化之潮流，循各国已行之先例，鉴其利弊得失，思之稔熟，筹之有素，而后订为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军政时期，第二、训政时期，第三、宪政时期。”“乃于民国建元之初，予则极力主张施行革命方略，以达革命建设之目的，实行三民主义，而吾党之士多期期以为不可。……莫不以为予之理想太高，‘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也。”“夫革命之有破坏，与革命之有建设，固相因而至，相辅而行者也。今于革命破坏之后，而不开革命建设之始，是无革命之建设矣……。”“是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必相辅而行，犹人之两足，鸟之双翼也。惟民国开创以来，既经非常之破坏，而无非常之建设以继之。此所以祸乱相寻，江流日下，武人专横，政客捣乱，而无法收拾也”。^①他还认为，“探索家之探索”，“以求其发见”，“伟人杰士之冒险”，“以建其功业”等等这些“行”，是“人类进化”“必要之门径”。^②这就是说，人民和革命党推翻清政府，实施革命方略是“行”；探索家和伟人杰士“冒险”“探索”也是“行”；而“奉行革命宗旨”，除去“官吏贪污，政治腐败之为害”，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建设一世界最文明进步之中华民国”，^③则更是“行”。

总起来说，在“行”的问题上，孙中山明确肯定了“科学实验”是“行”的一种形式，他所说的“行”，实际上已经包括了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主要实践，并且不自觉地初步地接触到了“行”的社会性、群众性和历史性。这充分说明孙中山较大地扩大了“行”的范围，使“行”的实际内容不仅大大超出了中国古代哲

①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04、205、206、207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22页。

③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63、146页。